

從《觀察》看中國

自由主義認同及其困境

• 王中江

自由主義緣何被重新點燃及其基本立場

自由主義不斷被申說和認同的原因很多，或者它本身就是一個歷史過程，需要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這是一個總的趨勢）；或者它誤入歧途並遇到挫折而不得不重新進行自我確認（如哈耶克 [Friedrich A. von Hayek]、波普爾[Karl Popper]）；或者相應於不同的歷史條件，它需要進行及時調整以便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生活（如羅爾斯 [John Rawls]、諾齊克 [Robert Nozick]）；或者在一個國家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它從未被實踐過，人們一直渴望它成為現實。如此等等。

自從十九世紀末自由主義在中國降生開始（嚴復是一位先驅性人物，雖然有人根本不承認嚴復是自由主義者），中國自由主義者不斷申說和認同自由主義的原因，始終都集中在「自由」和「民主」的現實化上。中國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不能作出理論上的貢獻是不足為奇的，在一個連起碼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的社會中，我們沒有理由期望他們還有心思去發展自由主義理論。但這也不意味着中國自由主義者要對中國一直拒絕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政治實踐承擔主要責任。在二十世紀40年代後半期，一些有利的因素和嚴重的社會政治危機，共同激發了主要來自知識階層的自由主義者重新點燃了中國自由主義的火炬，在短暫的幾年中，展開了一場有一定聲勢的自由主義呼籲和爭取運動，「自由」、「民主」和「法治」等價值和理想，作為中國社會和政治實踐的最重要和最迫切課題，再次被推到了時代的前沿。周圍聚集着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觀察》周刊，在這次自由主義運動中，與外圍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和影響較大的老牌《大公報》等刊物相互呼應，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必要格外關注。

自從十九世紀末開始，中國自由主義者不斷申說和認同自由主義的原因，始終都集中在「自由」和「民主」的現實化上，而不能作出理論上的貢獻。在一個連起碼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的社會中，我們沒有理由期望他們還有心思去發展自由主義理論，但這也不意味着他們要對中國一直拒絕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政治實踐承擔主要責任。

簡單回顧一下，在40年代後期之前，中國自由主義先後經歷了變法派嚴復和梁啟超的自由主義、「五四」自由主義（以《新青年》為代表）、20年代後期的「人權主義」（以《新月》為代表）、30年代的「民主主義」（以《獨立評論》為代表）、40年代初成立的「中國民主政體同盟」（延續到40年代末）等階段。整體上說，40年代後期的自由主義運動，是此前中國自由主義歷史過程前後相承的繼續。

從二十世紀40年代開始到後半期，國內外不同程度的一些有利條件先後出現，為自由主義運動提供了契機和誘因。從外部國際政治秩序來說，世界整體反法西斯主義陣線的勝利，加強了人們對自由民主的信念。雖然在所說的英、美、法、蘇和中等「五國聯盟」中，只有前三國才算是比較典型的自由民主體制國家，而後兩國都不是，但後者也甘願以民主同盟國自居。特別是戰後，美國直接介入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中，直接要求中國通過改革建立起自由民主體制。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離華前發表聲明，明確支持中國的自由份子，希望自由主義者能夠成為中國的主導力量。從中國社會內部來說，因共同抗日而形成的比較廣泛的戰時統一戰線，起到了容納不同黨派的作用。在一定意義上，國民黨和共產黨彼此得到承認。1941年，以自由主義為整體政治傾向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正式成立。1944年9月的民主政團同盟會議，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一般認為，存在於國民黨內部主要由政僚、企業家和教授構成的「政學系」，具有某種自由民主傾向，這對於外部的自由民主人士來說，則是爭取自由民主的直接政治資源。中國戰時最著名的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雖然直接和公開地受着國民黨意識形態的影響(如黨化教育課程)，但在那裏卻聚集着一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這所物質上異常困難而精神上卻充滿着無限活力的大學，事實上成了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堡壘^①。據統計，《觀察》周刊所列出的70位固定撰稿人中，有26位是出自這所大學。

戰後，與「和平統一」目標緊密相聯的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社會政治目標已經不能迴避。初期的一些良好趨勢，直接地激發了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的熱情並使他們感到樂觀。1945年，在外部美國政府的調解和內部獨立自由人士及知識份子的要求下^②，國共兩黨進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慶和平談判。1945年底，在馬歇爾調停下，國共簽訂了停戰協定；繼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在會議通過的決議中，與自由民主政治直接相關的「和平施政綱領」包括的內容有：尊奉三民主義為建國之最高原則；在蔣主席領導下，建設統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國；確認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黨派平等合法為達到和平建國之途徑；用政治文化解決政治糾紛^③。這裏的綱領體現了知識份子對自由民主的基本要求。

由《觀察》周刊所集中體現的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自由主義運動，正是在以上背景之下形成的。據儲安平在《觀察》周刊創刊半年後所作的回顧，在此之前，他和他的朋友曾主編過一個刊物——《客觀》周刊^④，因他們只是「主編」而不是「主辦」，所產生的不合於他們理想的處事方式，不久就使他們放棄了這個刊物。但是，從這兩個刊物的精神氣質來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正是由於短暫出版的《客觀》很快贏得「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學人」的鼓勵及其突然中止的令人惋惜，儲安平和他的朋友們，決定「主辦」一個符合他們自己立場、態度和水準的刊物。1946年1月在重慶召開發起人會議，決定了刊物的名稱、緣起和徵股簡約。他們相信，國內擁有非常廣大的一批自由思想學人，他們需要一個能夠充分表達言論的全國性刊物；超然於黨派之上的自由思想份子的公正言論也一定能夠贏得廣大的讀者。對當時的儲安平來說，創辦這個刊物的真正困難並不在於「當局」的態度，這表明出版和言論方面實際上存在着「一定的」自

在二十世紀40年代，國內外先後出現一些有利條件，為自由主義運動提供了契機和誘因。從外部國際政治秩序來說，戰後美國直接介入中國的社會政治生活，要求中國通過改革建立自由民主體制。從中國社會內部來說，因共同抗日而形成的比較廣泛的戰時統一戰線，起到了容納不同黨派的作用。

由度。這也許就是儲安平說出下面這句話的根據：「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問題了。」^⑤經過經濟條件方面的努力，他們終於在1946年9月1日推出了《觀察》周刊創刊號。正如發刊詞〈我們的志趣和態度〉所說，這是一個超然於不同黨派之上對國事發表意見、議論時政的「政論性」刊物，它以「民主」、「自由」、「進步」和「理性」為「放言論事」的主要原則。

在這些原則之下，他們建構了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⑥。具體來說就是，其一，從原則上認同自由的價值和理想。但他們對自由的解釋卻並不一致，或者把自由看成是一種目的，或者把它看成是一種價值；或者注重其內涵，或者強調其外延。同時也可以看出，人們對自由和自由主義的處理方式都比較簡單。其二，把自由同民主、法治和平等密切地結合起來，試圖建立社會民主主義或平等自由主義、法治主義。一些人相信，早期西方自由主義和政治民主，注重個人的自由和權利，注重不干涉和自由競爭，注重民治，結果則產生了經濟上的不民主和不平等，產生了剝削和貧窮。共產主義思潮及蘇聯社會主義，恰恰是要克服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病，實現經濟民主和平等，消滅剝削和貧窮。但是，蘇聯社會主義卻又有忽略個人自由和權利、忽略政治民主的弊端。因此，這些人的基本傾向和期望是，把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結合起來，以汲取蘇聯社會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二者之長，並避免二者之短。其三，對國共兩黨採取批評或拒絕合作的獨立立場。一般來說，相對於政治現實而言，只要是政治理想，它就不僅是一種政治期望，而且也是一種政治解構和批判。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的自由民主政治觀和價值觀，同樣如此。因為在當時的自由知識份子看來，國共兩大政治集團和勢力，對自由和民主都沒有真誠的興趣。認清了國共同自由和民主不相容的自由知識份子，對現實政治的立場和態度，就只能是既無法接受國民黨，也無法認同共產黨。當然，在程度上他們並非完全不偏不倚，在客觀上他們或者同情於一方。當時有所謂「第三條道路」或所謂「中間派路線」的選擇，試圖形成一種有影響力的政治呼聲以對抗國共兩黨。但是，這種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首先受到了國共意識形態的左右夾擊，特別是左翼中共意識形態的批判。其四，強調通過漸進的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實現自由民主等價值。40年代後期的中國自由主義者，一般來說既不是保守主義者，也不是激進主義者，他們主張通過和平及漸進的改革，走向自由民主之路。具體到40年代後期的中國自由主義，它堅持和平以及漸進改革的政治路線，也具有特殊的所指和意圖，即反對國共兩個政治集團的武力主義及其所進行的「內戰」。當時在知識份子之中出現了是「和平第一，自由第二」還是「自由第一，和平第二」的爭論。

在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看來，國共兩大政治集團和勢力，對自由和民主都沒有真誠的興趣。因此自由知識份子既無法接受國民黨，也無法認同共產黨。當時有所謂「第三條道路」的選擇，試圖形成一種對抗國共兩黨的政治呼聲。但是，這種自由主義的中間路線，受到了國共意識形態的左右夾擊。

自由主義何以被再次拒絕

讓《觀察》自由知識份子群體感到尷尬，或者更準確地說讓他們苦澀不已的無情事實是：正當他們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時候，他們失去了言論的自由。1948年

12月24日，當《觀察》出版到第五卷第十八期時，它遭到了國民黨政府查封。這份最高發行量曾達到10.5萬份的「自由主義刊物」，一夜之間就輕易地被專制政府摧毀了。照一年後復刊的《觀察》所說，它「終遭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迫害：刊物被封，同人被捕，資財損失，社務解體」。極具反諷情調的是，《觀察》同人的這一對國民黨政府的控告，恰恰是在知識份子學習改造過程中向共產黨進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時作出的。

狹義地說是《觀察》、廣義地說是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群體，在他們來不及作出冷靜反應時，他們很快就被瓦解了，速度如此之快，讓我們這些離他們並不遠的後人也難以置信。如果我們把《觀察》創刊號的發刊詞和恢復時的復刊詞比較一下，恐怕沒有人會認為，前後竟是同一刊物。《觀察》或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失敗，再次證明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境。

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根源何在呢？一種解釋是自由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問題似乎只是「中國」不能適應自由主義。但這種不適用，並非天生的永遠不能適應，而是人為的抵制。對於政治上的少數權勢集團來說，他們從來不缺乏「自由」，他們也從來不缺乏「權利」。豈止如此，他們實際上享受着「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權利」（也是權力），具有這種「自由」和「權利」，同時也意味具有極大的利益和資源。如果自由、民主、權利、利益和資源被整個社會公平地擁有和分享，他們「最大限度」的「自由」、「權利」必然會受到限制，他們各種特殊的利益和資源也將喪失。如果可能的話，誰願意輕易放棄呢？

「自上」引導和建立現代自由民主秩序和價值的道路，既然被政治領袖一次又一次地封死，符合邏輯的說法是應該由「自下」的民眾來推動和爭取。這一點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不管結果如何，「自下」的推動和爭取，總會有所影響。但是，現代專制的統治技術，如宣傳和武力的使用，都非常有效，這就使得「自下」的要求難以奏效。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者何以自處呢？也許他們應該尋求機會成為政治行動人物。這一點極其關鍵。但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清高式的對政治冷淡及其半推半就，恰恰使「最壞者當政」。

中國自由主義者是否誤解了自由主義呢？以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嚴復和第二代代表人物胡適為例切入這個問題是比較合適的，因為他們都是人們公認的西學領袖。從主觀願望來說，嚴復反對對另一種思想的誤解和濫用。我們堅持認為，以英美為主要資源的嚴復和胡適的自由民主觀念，在根本之點上是忠實的。嚴復和胡適都不是國家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從整體上看，他們是把個人設定為國家的基礎，國家如何取決於構成它的個人如何，嚴復強調「民智」、「民德」和「民力」，胡適強調「易卜生主義」，都是基於此種意識。這與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抑制個人的傾向截然對立。當然也有誤解自由的自由主義者，如張東蓀。他的誤解根源於試圖把法國自由民主觀念和蘇聯社會主義自由民主觀念結合到一起的奇怪念頭。不過自由主義者對自由主義的誤解或非純正性，至多是有時幫助了國家主義和集體主義，而不是自由主義失敗的主要原因。

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作為理想的「平等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衝突。當輸入進來的法國的平等觀念、俄國的社會主義同中國傳統的大同和均平理想結合一起時，平等主義在中國備受青睞。中國烏托邦主義的核心就是「平等

《觀察》或40年代後期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失敗，再次證明了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困境。根源何在呢？一種解釋是自由主義不合中國國情。但這種不適用，並非天生的永遠不能適應，而是人為的抵制。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清高式的對政治冷淡及其半推半就，恰恰使「最壞者當政」。

具有社會良知和社會關懷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精英主義者，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得不游離於政治事務之外，既不能同當政者進行種種耐心的周旋，也不能同大眾建立起密切的聯繫，而自由知識份子之間又難以形成強大的聯合。這樣，他們對於「非現代性」政治既感到痛苦，又極其無奈和無所適從。

主義」，思想觀念(如無政府主義)上和社會政治實踐上的激進主義所追求的都是平等理想。這種平等主義或者要求無秩序的個人主義，或者要求集體主義，它與以保障個人權利和價值為基礎的自由和法治秩序格格不入。因此，推行這種平等，不僅將造成更大的不平等(如在貧窮程度上不平等)，而且只會壓制個人自由，剝奪個人的權利。

最後要提出的是自由主義者對政治所採取的態度。具有社會良知和社會關懷的自由知識份子，往往既是理想主義者，又是精英主義者，這就決定了他們不得不游離於政治事務之外，既不能同當政者進行種種耐心的周旋，也不能同大眾建立起密切的聯繫，而自由知識份子之間又難以形成強大的聯合，他們自視甚高並各持己見，不容易形成統一的立場^⑦，其結果一定是最壞者當政^⑧。自由知識份子對於「非現代性」政治既感到痛苦，又極其無奈和無所適從。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以胡適為代表，反覆追問中國自由主義為甚麼會失敗？他的回答主要是強調中國自由主義所需要的秩序、理性、價值手段在中國都不存在，而中國那時所需要的只是暴力^⑨。既不能動員群眾，又不能扛槍上陣的自由主義者，在以武力決勝負的中國，除了做一個痛苦的蘇格拉底還能指望甚麼呢？最後我要強調，在後進性的中國，恰恰又追求一種能夠解決一切問題的「最先進」的烏托邦主義、全能主義，相比之下，作為有限理性的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只能是退避三舍。

註釋

① 不管是當事者，還是後來的研究者，幾乎都異口同聲地稱讚這所戰時大學的自由氣氛。參見王中江：《理性與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學》(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王浩：〈誰也不怕誰的日子〉，《清華校友通訊》，復刊第18期(1988年)；謝泳：〈西南聯大知識份子群的形成與衰落〉，《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12月號。

② 如1946年，西南聯大教授張奚若、錢端升等人士聯合致電蔣、毛，要求進行和平談判，廢除一黨專政。

③ 對於政治協商會議的結果，各方基本上滿意。中共的反應則更為積極。參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736-37。

④ 1945年10月作出決定，11月11日出版創刊號(八開大型周刊，十六面)，編輯出版的主要動機是，「那時正是抗戰剛告勝利，政治醞釀改變的時候，多年以來，在『抗戰第一』的大帽子下遮蓋着的許多積鬱，我們這時秉筆直言，亦確能言所欲言」。〈辛勤·忍耐·向前——本刊的誕生·半年來的本刊〉，《觀察》，1卷24期(1947年2月8日)。

⑤ 汪榮祖：〈自由主義與中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0年12月號。

⑥ 顯然，這不是每一個自由主義者都持有的四種立場，而是在許多自由主義者中所顯示出來的幾種主要傾向。

⑦ 金岳霖：〈優秀份子與今日的社會〉，《晨報副鐫》，1922年12月4日。

⑧ 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著，王明毅等譯：《通往奴役之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頁129-45。

⑨ 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1917-1950)》(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頁368。